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李湖光 著



问鼎中原

大清八旗军关内战史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问鼎中原

大清八旗军关内战史

李湖光 著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鼎中原:大清八旗军关内战史/李湖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7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ISBN 978-7-307-18076-5

I. 问… II. 李… III. 八旗兵—军事史—史料 IV. E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0037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3 字数: 47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8076-5 定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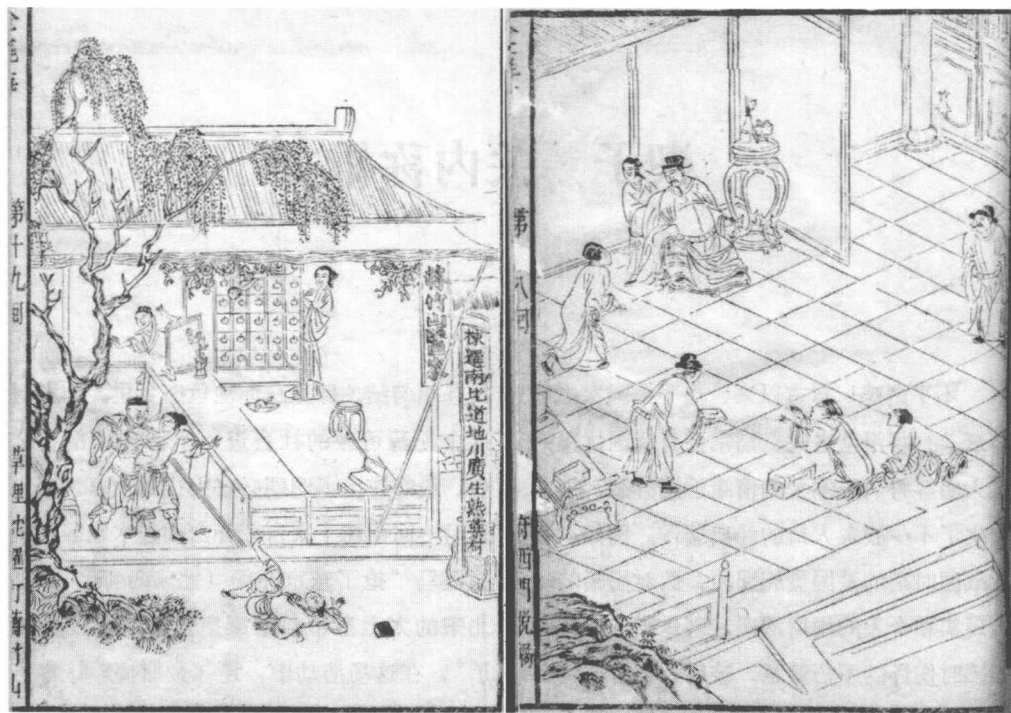
楔子 关内称雄	001
第一章 鹿死谁手	014
第二章 一再较量	040
第三章 席卷江南	064
第四章 烽火重燃	097
第五章 势不两立	120
第六章 异军突起	159
第七章 沿海风云	195
第八章 犬牙交错	211
第九章 以战练兵	237
第十章 峰回路转	255
第十一章 大江狂澜	284
第十二章 周旋到底	312
尾声 余波未了	343
主要参考书目	359
致谢	363

楔子 关内称雄

不平则鸣！自古以来，当一个国家由盛转衰，行将没落之时，常常会有忧国忧民的文人墨客将满腔不平的情绪诉诸辞赋，由此产生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经典著作。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屈原，面对黑暗的政治现实和个人的坎坷遭遇，创作出《离骚》等感时伤怀的不朽篇章，被后人千古传诵；唐代诗人杜甫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惨烈浩劫，为此而撰写了《三吏》等深刻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获得了“诗史”的崇高荣誉。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到了沧桑世变的明代，尽管没有出现可以与屈原、杜甫比肩的诗人，但随着通俗文学的兴起，自然有杰出的小说家针砭时弊，发出那个时代独有的声音。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在明代中后期面世的现实主义巨著《金瓶梅》，这本书的作者托名“兰陵笑笑生”，其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因而也失去了与屈原、杜甫一样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机会。然而《金瓶梅》却在文学史上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书中虽然有淫秽情节而屡受世人非议，但瑕不掩瑜。它通过假托北宋旧事的方式，无情地揭露明代中叶以后社会上的黑暗和腐败，描述了贪赃枉法的官府权臣显贵与穷奢极欲的富贾豪

绅互相勾结，肆无忌惮地鱼肉乡里。作者对这个无药可救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最终作出了明朝必将灭亡的预言。书中最后一回记述了来自关外白山黑水地区的金国人马“抢了东京汴梁（北宋首都）”，把北宋的太上皇帝与靖康皇帝“虏上北地去了”，在这场浩劫中，连《金瓶梅》这本书中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地点山东清河县也未能幸免，而北宋就此覆没。这些内容显示，作者含沙射影地认为无比腐朽的明朝将会亡于异族手上。

真是无巧不成书，《金瓶梅》记述北宋亡于来自关外的金国军队。明朝的灭亡也与一个叫做“后金”的国家有很大的关系，后金是努尔哈赤在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建立的，而努尔哈赤恰好曾经自称为金国的后裔。这个同样起源于白山黑水地区的国家刚建立不久就入侵明朝的辽东，吞并了关外的大部分土地。努尔哈赤亲手缔造的精锐部队八旗军，多次重创了明军的精锐部队，他的继任者皇太极，更将战火引入关内，多次出兵掳掠明朝的京畿地区与冀、晋、鲁等省份，有效地撼动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金瓶梅》插图。

立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终于在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灭亡了，但并非被先后与之作战了二十多年的八旗军所灭，而是被在关内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军颠覆了。与《金瓶梅》作者相类似的是，明末千千万万有切肤之痛的人都希望这个朝廷快点寿终正寝，特别是受到官绅地主残酷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正挣扎在死亡线上，故这种愿望尤其强烈。可与《金瓶梅》作者不同的是，他们没有企图凭借异族之手改朝换代，而是挺身而出、揭竿而起，力求依靠自身的力量埋葬这个黑暗和腐败的王朝。

自从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爆发农民大起义以来，经过大浪淘沙般

的反复筛选，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人最终在残酷的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起义军中实力超群的两大首领。而最能打仗的正是李自成。

李自成于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在陕西米脂县继迁寨的一个农民家庭，年幼时当过和尚，放过羊，成年之后到本县的圉川驿当了一名驿卒，后来，由于朝廷削减驿卒经费，他被迫下了岗，生活一下子变得全无着落，而官府与劣绅的联手欺压，又加速了他铤而走险的步伐。据《明季北略》等史籍的记载，李自成自幼“不喜读书，酷嗜拳勇”，长大后“多力善射”，具有一身好武艺。他青年时代就与铁匠刘宗敏、衙卒李过（李自成的侄子）意气相投，横行乡里。三人曾相聚于关帝庙“祀神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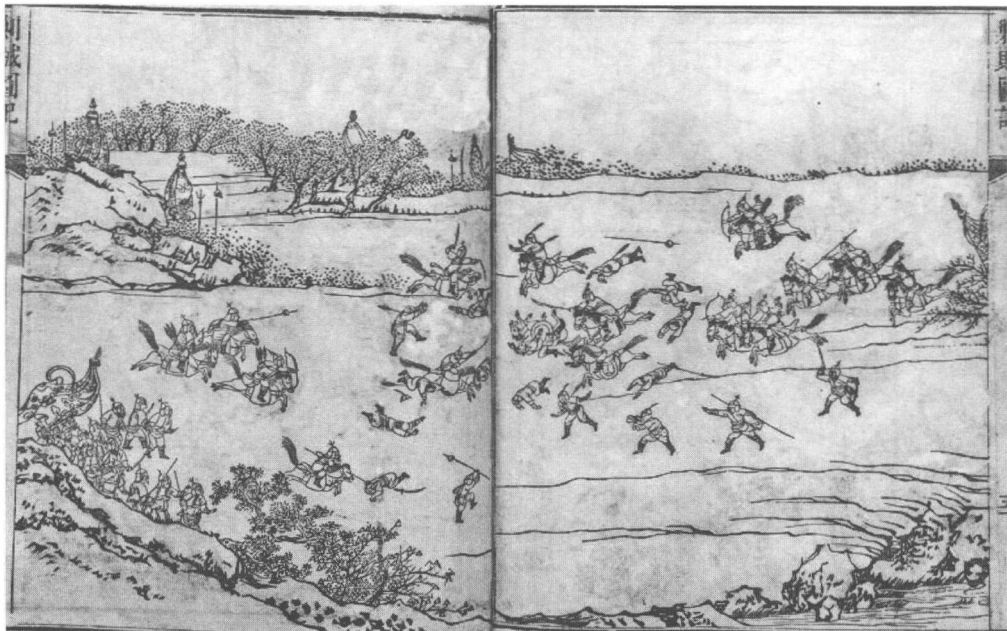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

誓”，效仿三国时刘备、关羽、张飞“桃园结义”的故事，立志要横行天下，做一番事业。在明末天下大乱之际，李自成终于得遂生平所愿，在家乡与志同道合之辈啸集在一起，在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投入到明末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浪潮当中。

这场农民大起义首先在1627年（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爆发于陕西地区，起因是自然灾害频繁，致使“连年赤字，斗米千钱”，而腐败透顶的官府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仍然横征暴敛，从而把越来越多的饥民逼上了揭竿而起的道路。“星星之火”在陕西四处蔓延，各地的流民、饥军与驿卒互

相联络，前呼后应，而此起彼伏的暴动浪潮逐渐向四周省份扩展，终于酿成了难以扑灭的燎原大火。山西、河南、四川等地纷纷告急，连京畿地区也受到波及。没过多久，参与起义的人数达到了二三十万之多。

李自成先后跟随过王自用、高迎祥等著名的义军领袖，由于他既勇猛、又有胆量，很早就军中扬名立万，成为一名新晋的头目。他的部属编为“八队”，以号令一致，军纪严明而著称，甚至连他的敌人也认为这支部队的战斗力“雄于诸寇”，在各路起义军中的表现首屈一指。从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到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的八年时间里，李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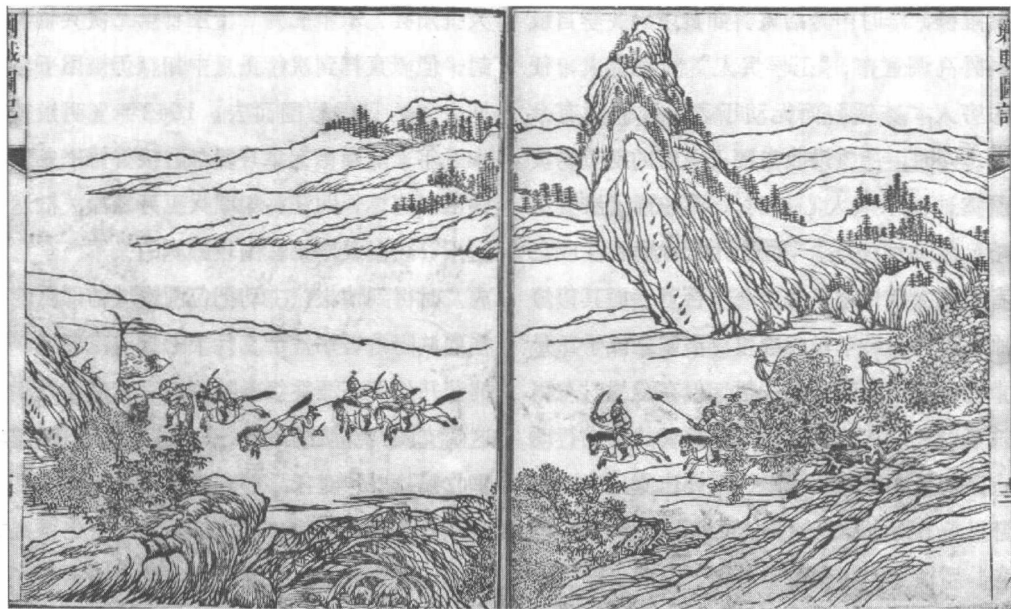
▲明军对义军“围追堵截”（一）。

成率部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汉中、陕北、宁夏、甘肃、四川与潼关等处，攻克过延川、绥德、米脂、宁羌、广元、昭化、剑州、梓潼、江油、黎雅、青川等一批州县，歼灭了大量官军，所部的势力也从小到大，发展到三四万人。在此期间，王自用于1633年（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春在山西被川将邓玘射杀，高迎祥于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七月在陕西被总督洪承畴俘杀，使得李自成在义军中的地位后来居上，成为了“闯王”。此后，西北的起义军逐渐形成了李自成与张献忠两大势力。

由于官军调来重兵围追堵截，各路起义军在流动作战的过程中损失惨重。特别是作为朝廷重点打击对象的李自成，他在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遭受到洪承畴与孙传庭等明朝封疆大臣的合击而几乎全

军尽没，仅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而出，四处躲避，潜伏于商、洛山中的茂密森林里面，不敢随便露面，异常狼狈。由于处境不利，另一位义军领袖张献忠于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春在湖北谷城接受了朝廷的招抚，其后，罗汝才等十多位名噪一时的义军头目先后俱降。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然而很快又高潮迭起。与明朝貌合神离的张献忠在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五月初九重新竖起反旗，会合罗汝才等部转战于湖广、四川，将大量官军主力部队吸引过来，无意中让颠沛流离的李自成有机会东山再起。蛰伏已久的李自成所部果断把握时机，于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六七月间放火焚烧辎重，轻装前进，从湖北房县地区经陕西平利、洵阳、商



▲明军对义军“围追堵截”（二）。

丘等地出其不意地突入河南。这次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让屡受挫折的义军绝处逢生，并带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奇效，由此在往后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催生了几次举世瞩目的大决战，一下子扭转了历史的进程。

当时河南的形势已对明帝国非常不利，这个地方由于连年遭受旱、蝗等灾害，已是哀鸿遍野，而官府加紧搜刮，筹集军饷的行为让局势如火上浇油，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良民为了活命而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致使号称“天下心腹”的中原地区到处都是“土贼”，史载“鼠窃狗盗，千百为群者，不可胜数”。根据《国榷》等书的记载，明朝在河南的防务异常薄弱，官军的总兵力尚未满万。这是因为河南周围的省份恰巧在此前后相继发生激战，牵制了关内明军的大部分主力。特别是湖广、四川等地，硝烟始终未息，杨嗣昌率领的十多万人正四处

奔波，追剿着张献忠与罗汝才。此外，关外的清兵也步步进逼，使得明朝不得不分兵应付，命令在关内镇压起义军时立下显赫功勋的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带兵十三万出关防御。适逢其时的李自成来到河南之后简直是如鱼得水，接纳了一批又一批前来归附的饥民与“土贼”，到了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十月，他的部属已由最初的千余人迅速提升至数万人，还吸收了牛金星、宋献策等知识分子做谋士。针对当时激烈的社会矛盾，李自成等人及时发出了“均田免粮”的号召，主张让贫困农民有田可耕以及减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由此受到灾区百姓的热烈欢迎。这支今非昔比的队伍连续攻陷了宜阳、永宁、偃师、灵宝、新安、新丰等地，并于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攻克豫西重镇洛阳，擒杀了福王朱常洵与南京兵部尚书

吕维祺，一时声势浩大、如日中天。李自成对外高调宣布：“王侯贵人”剥削穷人，任由穷人“冻馁”而无动于衷，因而死有余辜。同时，还将没收自福王王府的财货物资赈灾，以争取人心。时人撰写的《豫变纪略》生动地描述：“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李自成乘攻克洛阳之威于二月十二日袭击河南省会开封，他在激战时左眼被箭射中，从此失明，持续数天的攻城行动也因遭受守军的顽强抵抗而被迫停止。这支部队撤围后向西转移，伺机卷土重来。不久，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和，主动率部前来河南浙川，配合李自成作战，使战局更加有利于义军。

河南的局面让明朝统治者如坐针毡，不得不从周围省份调集主力临时救急，围剿李自成。敌对双方决战的序幕即将展开。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九月，大规模的较量在河南项城一带发生了，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率四万人出潼关与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虎大威带领的两万人在河南新蔡会师，准备进攻义军。事先得到消息的义军取消了进军湖广的计划，假装撤向汝南，但将主力埋伏于孟家庄附近的松林里面，等到尾随而来的明军进入埋伏圈，再在初六这一天发起突袭，打得贺人龙、虎大威、李国奇与杨文岳等人落荒而逃，俘杀了傅宗龙。李自成重创明军“关中精锐”部队后，在数月之间连下商水、洧川、长葛、叶县、南阳、邓州、襄城、镇州、新野、唐县、泌阳、舞阳等一

大批州县，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次兵临开封，但一直打到次年正月中旬，仍被阻于坚城之外，只得解围而去。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二月，接替傅宗龙为陕西三边总督的汪乔年率兵三万经潼关抵达洛阳，企图袭击正在围攻郾城的义军。李自成及时得到情报，主动把包围郾城的部队调往襄城阻击官军，于二月十七日攻克襄城，捕获并处死了汪乔年。随着傅宗龙与汪乔年这两支陕西部队的惨败，大批散兵游勇被义军收编。以致时任兵部右侍郎的侯恂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忧心忡忡地说道：“天下之强兵劲马，皆为贼有！”

在河南纵横驰骋的李自成连克豫东大批州县，扫清开封的外围障碍，以号称“百万”的兵力于五月初二第三次包围了这个军事要地。这次，义军一改前两次速战速决的战法，转而采取长期围困之策，耐心等待时机破城。远在北京的明思宗急令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率十八万兵救援（号称“四十万”），这支临时凑合的部队以左良玉所部的十万人为主力，于五月十三日会师于开封以南的朱仙镇，威胁义军的侧翼。李自成与罗汝才暂时将主力调离开封，南下迎战。义军先掘壕截断敌退路，再筑起炮台，猛烈轰击，激战至五月二十三日，打得官军全线溃散，而追击的骑兵四处拦截杀戮，斩获良多。左良玉逃往襄阳，丁启睿经许州、光州逃往固始，杨文岳、虎大威、杨德政逃往归德、汝宁等地，苟延残喘。决战获胜的义军收编了数万降卒之后，于二十五日重围

开封。到了九月中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守军狗急跳墙，竟然掘开黄河大堤的朱家寨口，放水淹城，企图死中求生。《明史》记载当时义军亦欲掘开马家口河灌城，一时之间“二口并决，声如雷……城中百万户皆没”。在茫茫洪水中，唯有明朝的部分宗室贵族、文武官员以及两万残余军队得以逃生，而溺死万余人的义军立即拔营，向西南方向撤离。李自成虽然没有拿下开封，但开封城也因此而毁于水灾，无数人葬身鱼腹。

明朝为了拯救开封，曾经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九月底令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与总兵高杰、左勣、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率兵两万经潼关进入河南，但在行军途中，已经传来开封毁于水灾的消息，可这支部队没有退回陕西，而是继续向南阳进发。义军主力向西迎战，于十月初一在郟县与对手碰个正着。大战就此爆发，李自成佯败后退数十里，丢弃了大量辎重物资，等到官军纷纷争夺财物而乱作一团时，马上抓住时机反击，杀获数千人，迫使陕西军残部退入潼关。陕西军之败与后勤保障不力有关，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很多官军士卒采摘未成熟的“青柿”充饥，在“冻且馁”的情况下，终于大败。史称此战为“柿园之役”。其后，李自成乘势夺取河南未下州县，于闰十一月强攻汝宁，俘杀杨文岳，彻底歼灭了滞留在这里的保定援军，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分土地。明朝在河南的统治也随之基本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

这时，处于两线作战状态的明朝，整个军事形势江河日下，不但在中原损兵折

将，在关外也屡受挫折，其中，洪承畴辖下军事集团的十多万军队与清军在松山、锦州一带决战时一败涂地，就连洪承畴本人也成为了俘虏。至此，明朝剩余的精锐部队主要还有三大军事集团，即是继续在关外抵御清军的吴三桂集团；活动于湖广地区的左良玉集团与陕西地区的孙传庭集团。吴三桂集团是阻止清军入关的主要力量，难以调入关内救急。左良玉集团在朱仙镇一战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后，便萎靡不振（史称左良玉的“亲军爱将”大半战死，就连母亲与妻子也被李自成所俘，但左良玉突出重围逃到襄樊地区后，到处抓壮丁与招降纳叛，甚至驱赶“襄阳一郡人”以充实军营，似乎在表面上又恢复了元气，号称“二十万”。然而，新收编入伍的乌合之众经常不受军纪的约束，而左良玉亦“渐衰多病”，故此，这支军队已不复当年之勇）。孙传庭集团自从郟县失败后返回陕西重新招募勇士，屯田积粟，仍然拥有一定的实力。另外，与武将左良玉相比，作为文官的孙传庭，更服从朝廷的指挥，俨然成为了统治阶级处于灭顶之灾时的救命稻草。

在朝廷的严令之下，孙传庭于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一携同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率十万人再出潼关，企图在洛阳与河南总兵陈永福会师，然后配合湖广的左良玉集团夹攻义军。此前，义军已由河南移师湖广，逼退左良玉所部，顺利占领襄阳、荆州、枣阳、宜城、谷城、光化、承天等地，一度打到汉阳附近，控制了湖广北部地区，并于1643年（明

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初将襄阳改为襄京，正式建立起中央政权。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以牛金星为丞相，设立吏、户、礼、兵、工等六部。为了集中军权，李自成先后杀死了贺一龙、罗汝才、袁时中等归附的义军领袖，兼并他们的大多数部属，牢固地确立了自身独一无二的地位。当孙传庭大举进犯的消息传来，早有准备的义军主力回师河南迎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派出羸弱的部队稍加阻击即后退，有意放弃了阌乡、洛阳、汝州等地。孙传庭一路告捷，连克宝丰、唐县，孤军深入到了郟县这个小县城，很快就出现了粮饷不继的问题。官军在河南这个受灾严重、赤地千里的省份根本征不到足够的军需品，只能依靠从后方运送来的给养，可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粮饷迟迟未至。李自成乘机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骑兵秘密绕道抄了官军的后路，掐断了对手的供应线。进退失据的孙传庭在九月中旬慌忙回师，企图打通供应线，但军心已乱，竟被全线反攻的义军在南阳追上。经过一番生死搏斗，官军兵败如山倒，仅仅死亡人数就超过了四万。李自成全力进行追击，史载“一日夜逾四百里”，缴获“甲仗马骡数万”，给予陕西兵毁灭性的重击。孙传庭、高杰、白广恩等人虽然侥幸逃回，但从此一蹶不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孙传庭前后两次在郟县、南阳一带被李自成用“诱敌深入”之策击败，反映出明军前线文官统帅所固有的志大才疏的通病，也与那些在京城里遥控指挥的纸上谈兵之辈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胡乱催促进军

有关。

李自成所部在短暂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在河南的项城、襄城、朱仙镇与郟县、南阳等地进行了五次大战役，歼灭了二十余万官军，既重创了左良玉集团，也摧毁了孙传庭集团，致使朝廷再也纠集不了一支能与之抗衡的部队，在此后不足一年的时间里，便迎来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早在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五月，李自成就打算采纳谋士顾君恩的主张，企图进军关中、消灭明朝布置在北部边境的部队，再取道山西，向北京发起最后的一击，而孙传庭集团的惨败加速了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同年十月，乘胜进攻潼关的李自成击毙了孙传庭，打通进军陕西之路，接着摧枯拉朽般杀入西安，分兵攻取了陕西三边等地，所向披靡。到了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正月初一，他雄心勃勃地在西安正式立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实行了封官定爵等一系列完善政权的措施。在一片告捷声中，义军主力渡过黄河，席卷山西，于二月初八攻下太原之后兵分两路，主力由代州、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昌平向北京挺进；另一路偏师东出固关，取道真定、保定，以牵制京城附近的官军。李自成、刘宗敏率领人马在进军途中，打死明总兵周遇吉，招降镇守太监杜勋与总兵姜镶、王承胤、唐通等一批地方大员，而明巡抚卫景瑗、朱之冯，总兵李守荣等拒不投降者先后自杀。当昌平于三月十六日失守时，北京已经藩篱尽失，岌岌可危。三月十七日，义军正式围城，士气低落的京军不

堪一击而纷纷投降，仅一天工夫，外城已经失陷。四面楚歌的明思宗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属下，哀嚎：“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带着一名叫做王承恩的亲信太监登上煤山上吊自缢而亡。三月十九日，义军各部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处进入内城，终于完全占领了北京。在此期间，南线的刘芳亮所部亦于蒲板渡河，拿下了怀庆、长治、彰德、大名、磁州、广平与真定，顺利到北京与主力会师。而东出

固关的偏师亦成功夺取保定，有力地配合李自成攻克北京的军事行动。统治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在各路义军齐心协力的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与李自成齐名的另一位义军领袖张献忠也没有虚掷光阴，他转战于湖广、四川、安徽等处，乘李自成为河南得势之机，南下攻克无为、蕪州、黄州、罗田、汉阳、武昌等地，并在武昌建立政权，号称“大西王”，当李自成杀死贺一龙、罗汝才等人，

吞并异己的消息传来，张献忠自知无力与之抗衡，遂离开武昌，进军岳州、长沙，向江西发展，最后转入四川，占领了重庆等地，作为驻军地点。这时，张献忠不得不承认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为正统，采用了永昌年号。此举显示李自成的声望在关内无人能及，已成了收拾残局，完成统一大业的最佳人选。

经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李自成攀上了军事生涯的顶峰。他的成功虽然与明军自身的腐败无能脱离不了关系，但起义队伍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法，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堵墙”战术。所谓“三堵墙”，顾名思义是将骑兵排列成三队（分别是红队、白队与黑队。每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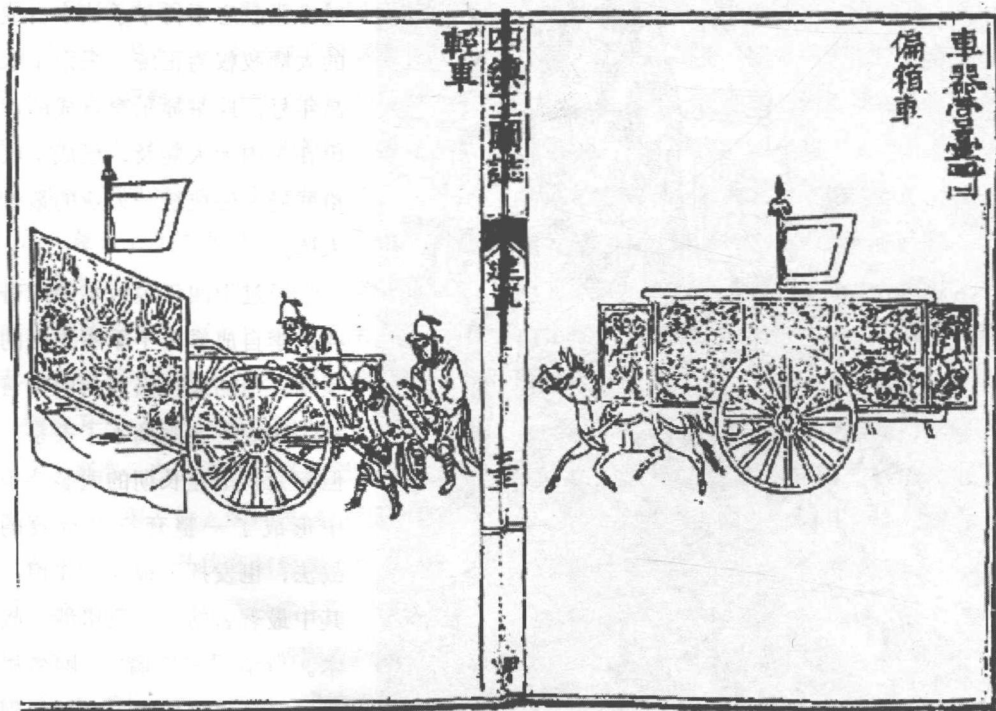


▲明思宗与王承恩。

人数从七千二百人到一万人不等)打仗。根据《绥寇纪略》《国榷》等史籍的记载,义军在临阵时经常首先派出骑兵做前锋,以这样的阵势迎战,然后采取佯败的战术,引诱明军追击,伺机在其他兵种的配合下反击,夺取最后胜利。典型的战例是在郟县大决战中,义军前锋骑兵用“三堵墙”战术,将孙传庭集团引入预先布置的埋伏圈中,令敌人陷入被动状态。史载当时义军布下的阵营从外到内共有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的“骁骑”,第五重是“老营”(义军的总部,里面有不少随军的家属)。虽然追击的明军已连破三重阵营,但却受到骁骑异常顽强的阻击,而残酷的搏斗使得一些官兵出现怯战情

绪,扰乱了军心。特别是孙传庭临时招募的一些新兵,他们在牵拉装载火器的战车时,看见冲在前头的士卒受挫,无不惊惶失措,叫嚷:败了、败了!纷纷弃车而逃,致使横七竖八的战车堵塞了道路,让前方的明军骑兵因退不下来而乱成一团,局面就这样彻底失控。义军及时发起总攻,“铁骑”凌空腾起,闪电般向前突击,步兵手执白旗乱打,凡被击中者,脑袋与兜鍪皆碎,从而风卷残云般地取得了决战的胜利。

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义军的兵种与装备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都是与明军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的结晶。众所周知,明代中后期的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某些精锐部队的火器装备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



▲明军的战车。

上），而铳、炮等管形火器更是当中的佼佼者，在战时不但首当其冲，而且全程使用，给对手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就拿在河南发生的朱仙镇与郟县这两次大决战为例，在朱仙镇之役中，杨文岳统领的一万名保定车营将士，素来凭着火器称强；而孙传庭在郟县大决战之前仿照传统的偏厢车与武刚车，制造了万辆以上的火车，车上可以装载火炮，也非常厉害。然而，明军引以为傲的火器部队无不一一失败，因为他们战时的表现远远比不上李自成的骑兵。

《平寇志》记载：李自成所部“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有二三十骑”。他们虽然拥有众多的马匹，可平时所乘的是骡，从不轻易骑马，以免战马疲惫，以致影响作战。基于同一理由，随军妇女以及辎重，也各自用驴运载。相反，与之对敌的官军多数“一人一骑”，马匹的数量处于劣势。据说，义军骑兵“马大肥捷”，必要时一昼夜可行三百里，完全能够起到兵贵神速的作用，而战时“壮贼人夹两骑，去来如飘风”，距离官军三四十步时，则“驻兵不动”，只是弓弩齐发，等到官军稍有退却的迹象，遂出动精锐骑兵从正面突击，或者出其不意地伏击其侧翼，直至将官军的战阵截断，再逐一击破。

从上述义军惯用的战法之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骑兵队伍比较注意轻、重骑兵配合作战。按照现代学者的观点，轻装骑兵多数采用灵活机动的方式出击，他们一般披挂轻甲（甚至不披甲），以弓弩等远距离作战的兵器为主。重装骑兵适合强行突阵，他们的

身体披挂着重甲，以刀枪剑戟等近距离作战的兵器为主。在战场上，由于轻装骑兵的弓弩，其射程远远比不上明军的铳炮，再加上骑手要分心驾驭马匹，难以频繁发射，因而在与明军正面对抗时占不了什么便宜，故常常做饵，采取佯败的方式，以诱敌深入。一旦明军中计进入埋伏圈里面，义军的重装骑兵便如天降神兵般现身，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势冲锋陷阵，用贴身近战的方式破敌。由此可知，重装骑兵对明军的威胁最大，他们也就是史籍所说的“骁骑”、“铁骑”，是义军骑兵中的精锐。就像朝廷的兵科给事中常自裕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二月的奏报所指出的那样：义军里面身穿“明盔坚甲”的重装骑兵皆“铁骑利刃”，“其锋不可当也！”

值得一提的是，义军的步兵也对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绥寇纪略》记载明军在追击佯败的义军骑兵时，曾经遭遇到数以万计的义军“伉健”步兵，这些人以长枪迎战，“击刺如飞”，配合自己队伍里的骑兵去夺取胜利。而在郟县大决战中，手执白旗乱打的义军步兵，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最后的胜利立下了大功。不过，李自成所部特别倚重骑兵，史称他在西安时制订兵籍，据说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这个数据虽然夸张，但也反映出他的部队里面，骑兵的人数比步兵多，这有利于在流动作战中快速行军。

除了野战之外，义军也积累了丰富的攻坚经验。李自成所部在河南攻城时，放弃了传统的依靠云梯攀援而上的战术，而是采取

凿城之法，下令攻城士卒每人必须凿取城墙上的一块砖，才算完成任务。这样做会让城墙上的窟窿越来越大，从初时的仅可容一人，慢慢变得可容十人、百人。那些专门深入窟窿里面挖掘的人们为了避免出现塌方，故意在窟窿当中留下一条足以起到支撑作用的“土柱”，以保护自身安全。当窟窿挖得足够大、足够深，他们便只将一条绳索的一端捆绑在“土柱”上，然后带着绳索的另一端撤回来。当大批人在远离城墙的地方用力拉扯着这条长长的绳索时，不一会儿，部分城墙便因“土柱”折断而崩塌了。由于凿城之法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冒着矢石的威胁在城下进行土方工作，容易出现重大伤亡，故善于流动作战的义军每当打下一座城后，在离开时往往将城墙“夷为平地”，以免资敌。到了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与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之后，当义军在战场上缴获了大量明军的火器，就逐渐改用新的攻城办法了。例如他们可以把火药装于瓮中，将之通过挖地道的方式埋藏于城墙底下，再引爆，而预先布置在附近的数千精锐骑兵等到城墙崩塌的那一刻立即千方百计地从缺口一拥而入，力图打对手一个猝不及防。他们还可以用大炮攻城，将墙上的城堞尽数摧毁，令守军因失去掩体而变得难以立足，然后强行登城。

总之，久经沙场的李自成所部已经建立了与其战法相适应的军事编制。当1643年（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在襄阳成立起中央政权时，这支部队便分为两大部分，即是负责野战攻城的主力部队与负责镇守的

地方军。而主力划分为中权亲军、左营、右营、前营、后营等“五营”。营中完全没有受人诟病的“以文驭武”的现象，所有的军事主官全部由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将出任。而军职分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级别，其中田见秀、刘宗敏为权将军，刘芳亮、袁宗第、李过、贺锦、刘希尧为制将军，谷可成、任继荣、吴汝义、马世耀、白鸣鹤、刘体纯、谢君友、田虎、张能、马重禧为果毅将军，张鼐、党守素、辛思忠、李友、刘汝魁为威武将军，他们被时人誉为“二十二将”，是军中的顶梁柱。到了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初在西安建国后，李自成按功劳的大小封授诸将以侯、伯、子、男等爵位，并对军制加以完善。例如将五营的名称定为中吉、左辐、右翼、前锋与后劲，规定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中营分别用黑色、黄色、白色、红色、青色等旗纛。这支军队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将士们要把“金帛、米粟、珠贝”等战利品全部上缴，每个人都不能私藏在战场上获得的金钱财物，违者处死。最高统帅李自成以身作则，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不好酒色，平素只食粗粮，与部属同甘共苦。并三令五申地要求麾下兵马不得妄自骚扰与杀害无辜百姓，有时还发帑赈灾，力求塑造出“纪律严明”的形象。特别是他针对官兵普遍扰民，军纪不佳的现象，高调宣布要“剿兵安民”，反客为主地占据了道德优势，因而在无数贫民的眼中成了不折不扣的仁义之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大顺政权控制的黄河南北

与长江部分流域的广阔天地中，从未发生过一次农民反抗的事，这与明朝灭亡之前烽火连天的情形恍若隔世。可见，大顺军这支屡仆屡起的百战雄师不但打击明军的战法有

效，而且争取贫困农民的政策对头，难怪会横扫中原，威震河朔，在关内处于无敌状态。